

# 明代嘉靖年间陕西玄狐教起义

赵 瑞 民

明代中叶,统治者荒淫腐化,政治黑暗。人民群众被敲骨吸髓,负担日重一日。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农民起义的烽火到处燃烧。嘉靖四年陕西乾州一带的玄狐教起义,是其中规模较小的一次。因记载这次起义的史料甚少,至今没有受到史学界的注意。笔者不揣浅陋,将各种零星记载汇拢梳理,略加考辨,供研究明史和陕西地方史者参考。

## 一

明代正德年间,陕西泾阳及附近几个县活动着一个秘密会社,叫做“玄狐教”。时人康海追记此事,写道:“昔予以正德戊辰(三年)归,见三数处风俗,则慨然兴怀焉,曰:嗟乎!何至是者!是必将有厚忧隐祸迤邐未艾也,否则何至是者!”<sup>①</sup>

玄狐教的活动区域,遍布泾水两岸,北起三水,南至渭河一线。据记载,“玄狐教不但泾阳一处,咸阳、礼泉、三原、三水、淳化、高陵处处有之,但不若泾阳之多耳。”<sup>②</sup>

玄狐教的内容和传教方式,今已难知其详。见于记载的是,“其妖师所至,家家事若祖考。惟其所需,极意奉承。”<sup>③</sup>“其妖师又令此辈照水鉴形,云‘某后当为何官’,‘某后当有何福’。愚民易惑,便尔坚志奉承,牢不可解。然心既希有官禄,志岂无怀叛逆?”<sup>④</sup>备受饥寒之苦的农民群众为玄狐教术师宣传的信念所鼓舞,在宗教的神秘气氛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因而对教中术师尊崇备至。虽然不能排除一定的迷信成分,但玄狐教术师所宣传的教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群众的要求,却是显而易见的。早期传教就播下了起义的火种,这一事实即便是封建士大夫也相当清楚。

地主阶级对这等事当然不能作壁上观,康海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虽然被黜居家,但阶级的本能丝毫没有衰退。他给陕西巡抚都御史蓝文秀、巡按御史王子衡都写了密信,请求急为处置。此二人亦不敢等闲视之,责成泾阳知县刘仲和设法区处。又有秀才,名曰杨芝,往巡抚衙门告密,说玄狐教贻害地方,要求制裁。巡抚衙门亦责成知县处置<sup>⑤</sup>。当时情势很危急,一则玄狐教尚在串连阶段,根基不固;二则教人没有武装,无法与官府公开对抗。幸而知县刘仲和“不谙事体”,“喧喧混混,乃借是将以功也”,玄狐教人得以闻知此事。他们利用当时官府的腐败,向各处衙门打点行贿。“致此辈托求太府,反谓官司生事。及其官司亦不能禁矣,而此辈方且深根固蒂,打点承对。摇手一呼,应者千万。”<sup>⑥</sup>那个秀才杨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县官以受重贿,将欲故勘;复畏人言,竟以他事致芝于死。此后虽有豪杰敢言之士,闭口不敢矣。”<sup>⑦</sup>由于玄狐教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声援者众多,不唯没

有使组织遭到破坏，还惩罚了一个与教人为敌的告密者。这样就使地方上的地主分子噤若寒蝉，不敢轻举妄动。从此，玄狐教日盛一日，“孽蔓犹滋，氛浸不消”，“此教风行二十余年”<sup>⑧</sup>。

此事后八年，乾州人樊绅<sup>⑨</sup>成为玄狐教的首领<sup>⑩</sup>。据《国榷》记载，“乾州樊绅(绅)，省掾也，有反相。藩伯误礼之，民渐指目。绅(绅)诈术诱其众，割布书约，谋不轨。”<sup>⑪</sup>康海记述，樊绅“多货而乐诞。方士、诞者皆集其门，附会绅(绅)意，行谀于绅(绅)，云绅(绅)当大贵。于是传播远近，所谓三教者举熙熙然从绅(绅)。而绅(绅)遂自居不疑，日召无赖男子习战修武，来者云集。又令妖人以照水法惑之，俾无畔志。洎三年，阴相结聚者数十万人。”<sup>⑫</sup>经过组织、训练的准备阶段，到了嘉靖初年，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武装力量。

发动起义是在嘉靖四年十月间。义军首领可知姓名者，除樊绅外，还有杨朴、张合、董汉等人<sup>⑬</sup>。起义前二十多天，义军已在集结。“迺者二十余日，往来兴平西南诸村。哨聚村民，椎牛掠马。肆为大言，略无忌惮。”<sup>⑭</sup>这时义军的声势已经张大，积极准备战马粮秣，聚集起义四方农民，从秘密活动转入公开招兵买马。樊绅等人“复召四方贼党，俾可起兵，如汉张角故事。”<sup>⑮</sup>他们准备首先攻取乾州城。“期某夕举火，城内诸妖为应。”<sup>⑯</sup>预备里应外合，一鼓而下。

乾州城，处在玄狐教活动区域的包围之中。泾阳、淳化、礼泉、兴平、咸阳等几个玄狐教盛行的地方，就在乾州周围。如果拿下这个堡垒，就会在泾渭二水的夹角地区中心开花，对周围几个县城造成高屋建瓴之势，然后分兵攻取各县城池，建立农民政权，将要容易得多。这一行动的重要性，敌人也很清楚，“州一破，贼势蜂起。素被蛊惑之人，观其行事罔觑，不知从者几千人！而指礼泉，南向鞏邑(武功)，势若破竹，夫复何忌？”<sup>⑰</sup>

义军的计划是里应外合，突然袭击，在乾州城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打它个措手不及。然而，义军的计划被乾州太守赵时探听到了。据《国榷》记载，是赵时收买了乞丐去刺探义军军情；而雍正《陕西通志》所载，是有人告密<sup>⑱</sup>。按：雍正《陕西通志》载樊绅等起义一事，是移录嘉靖二十年马理等所修《陕西通志》之文。嘉靖《通志》去起义之事时尚未远，纂修人之一马理就是陕西人。马理的家乡三原县<sup>⑲</sup>即玄狐教活动地区。故《陕西通志》所载似乎可信。

由于泄密，乾州城顿时戒备森严，太守赵时“即登城为御”<sup>⑳</sup>。加之攻城义军行动迟缓，未能如期而至，城内策应的玄狐教人亦不能及时发动。“妖党皆环视左右，将试刃于(赵)时。(樊)绅尚未至，(赵)时应之从容无惧色。姑给其众，使外御。明旦，搜得佩伪符官者数人，斩之。倾，绅众至门，(赵)时令投伪官尸城下，绅乃退之。”<sup>㉑</sup>

义军初起，未经战阵，规模较大的攻坚战，必然利少弊多。智取一旦变为强攻，及早引退，本是明智之策。但义军也因首战受挫，士气顿衰，遂使队伍解体过半。康海为乾州太守划策，就注意到了这一点，“盖村野之民，不知义理，与闻左道之言，便乃彻骨相信。是以反复牵连，胶固难解。而泾阳玄狐教人，何啻万数！所视以为进退者，特在二十一日之举耳。此举既败，则是教处之人解体过半矣。”<sup>㉒</sup>

义军首战不利，逡巡于乾州以南武功、兴平、周至、户县的中间地带。据记载，“此辈往来之地，止在高祖庙、马嵬、南上官、薛炉镇一带；其南过渭河则祖庵一带。而妻孥寄居

则眉县东南铁炉庵寨。”“贼众自言去唤所约银兵及泾阳玄狐教私人，复来攻城。”<sup>②③</sup>渭河北岸的义军仍在联络教人，而跨过渭河的一部分义军可能是接应南山中银矿的矿工队伍，即所谓“银兵”。也可能为义军退入南山做准备。《眉县志》卷七载：“嘉靖四年秋，乾州狂人樊仲（仲之误，即绅）、杨朴作乱。攻州城不克，乃济渭，寄妻孥于县南铁炉庵寨，潜结矿场银兵，图再举。”<sup>②④</sup>

这时，义军分散数处，战斗力大为削弱。就在攻乾州的第二天，义军有二十多骑在武功县立节渡口找船渡河，再次失利，丢弃马匹，涉水过河，西往眉县铁炉庵寨<sup>②⑤</sup>。此后，渭河一线被完全封锁，渭河两岸的义军被分割。《眉县志》卷七载：“当事者用武功康太史计画，移所在官司，自宝鸡至户，守山隘；从扶、岐诸县列截沿渭渡口，防其北侵。又令泾、咸、兴、礼愚民不得南迈应贼。”康太史即康海。所谓他的“计画”，载于《与乾州太守赵君书》中，曰：“今宜密切令人先去铁炉庵寨，抓探贼辈何在何往。若果招诱银兵，宜申行上司，火速移文巡检于翱（敖）<sup>②⑥</sup>，令其多方访逻搜捕。何也？伸（绅）等皆乡村游手好闲之人，止以妖人引诱煽惑，偶至如此。山途岷险既所不闲（娴），兵事倚伏又安有见？自宝鸡至户县牢谷（涝峪），一应山口务请上司指挥所至官司督人守把。贼必进退两难，束手就毙矣。若贼尚在此地滞留未发，宜密行宝鸡，把塞隘口，截其西奔；兼移周至，扬兵至逻，遏其东迈。凡武动、扶风、岐山、凤翔沿渭河道，但有浅窄可以列渡之处，及一应通行行船渡口，仔细提防，不许擅自放贼北渡。乃徐陈师压境，依前明加晓谕，立赏要成，则事更易图，计无不获矣。”这个“计画”可谓毒也！

有关其他各处义军活动的记载，今已不见。《眉县志》卷七仅载，“贼居铁炉庵（寨）五六日，候应不至，乃南趋矿场。”与康海所记相同。《国榷》卷五十三载义军“聚保杨千村”，未知孰是，待考。樊绅等人离开铁炉庵寨后，被官军俘获。其事有二说。《眉县志》卷七、《续武功县志》卷二、康海《姜武功平贼序》俱载为“南趋矿场，为于敖辈所擒。”词句大同小异。康海还说“人为知于敖辈设巧善获”，是樊绅等人中了官军的埋伏而被俘。雍正《陕西通志》卷五十二载，“至凤县，为人所擒。陇右、关南悉平。”

《明实录·嘉靖世宗实录》卷五十六载：“已而绅等复越狱，捕获伏诛。”《国榷》卷五十三载，义军惨遭杀害者“千二百人”。

## 二

明代中叶，由于皇室和官僚地主的肆意侵吞，造成土地高度集中。皇帝带头兼并土地，宗室、勋戚、中官、势豪也拼命地掠夺农民的耕地，扩大自己的田庄。由是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正德年间，北方爆发了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南方爆发了四川、江西等地的农民起义。

陕西省关中一带虽称富饶，但在此时亦已困顿。正统十年时，陕西渭南、富平饥民已是“闭门塞户，逃窜趁食”<sup>②⑦</sup>。因此，关中农民奋起抗争，决意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正是势所必然。

玄狐教，从封建文人们记述时所使用的某些诬蔑性言词来看，与众多的白莲教支派是一致的，如“授官”、“书符”等。只是没有提到白莲教所崇奉的弥勒佛，小有差异。明代初年，陕西境内就有白莲教组织的起义，并且坚持了四十多年<sup>②⑧</sup>。正德七年李五等领导的陕北

白莲教起义<sup>⑳</sup>，距玄狐教起义只有十几年时间，地域又相当接近。因此，玄狐教起义应是明代多次白莲教起义中的一次。

起义军的基本力量就是康海所谓的“村民”、“愚民”，是封建社会农村中最受地主阶级歧视的贫苦农民。这些人最易接受玄狐教所宣传的信仰，对于改朝换代，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很有信心。这便是“心既希有官禄，志岂无怀叛逆”。他们为阶级压迫的仇恨而奋起，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理想而斗争。

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樊绅，家资殷实，本人也曾在官场上混过。其他几个主要人物的身世不详。康海转述武功知县姜恩语，“伸（绅）辈皆膏粱子”<sup>㉑</sup>，可能其中有人和樊绅的家世相近。这些人因某种原因与封建统治阶级亦有矛盾，他们的造反动机，虽和广大农民群众不尽一致，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和农民群众走到一起。他们既有可能成为本阶级的叛逆，为农民群众谋利益；也有可能利用起义军作为工具，以求达到个人的目的。但在一个时期内，斗争矛头所向可以是一致的。玄狐教起义的时间短暂，樊绅等人不但与农民群众站在一起，而且站在斗争前列，起着领导作用。因此，玄狐教起义虽然是以“膏粱子”为首，但就其性质而言，仍然是农民阶级向地主阶级发动的攻击。

玄狐教起义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失败，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普遍存在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是根本的原因。此外，首先是起义军并没有组织成为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乾州攻城失利，义军便进退失措，冰消瓦解，不能集结队伍，寻找战机，组织上的松散是显而易见的。其次，乾州攻城失利后，樊绅等人事实上没有积极整军再战。虽然曾扬言联络教人、银兵，但几天之内即由偃伏而溃散，这固然有客观原因——义军被分割封锁，更主要的却是义军首领指挥上的失策。他们非但没有利用起义时造成的声威，集结兵力挥师向敌，相机再战，反而时时顾念寄顿于眉县铁炉庵寨的妻室老小，瞻前顾后，举棋不定，给敌人造成了可乘之机。

玄狐教起义历时极短，影响不大。但在明中叶的农民起义浪潮中，在白莲教组织的农民起义中，仍应有一席之地。在关中人民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象，为明末农民起义播了火种，这是应予肯定的。玄狐教这一明代民间的秘密会社，历来未被注意，也请研究白莲教的学者予以重视。

#### 注 释

①⑩⑫⑳（明）康海《康对山先生全集》卷三十二《姜武功平贼序》。

②③④⑥⑦⑧⑪⑰⑲⑳：《康对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一《与乾州太守赵君书》。

⑤参见上引二文。

⑨《明实录·嘉靖世宗实录》卷五十六、雍正《陕西通志》卷五十二作“樊绅”，《康对山先生全集》、《国榷》等作“樊伸”，今依《实录》。

⑪《国榷》卷五十三。

⑬“张合”《嘉靖实录》如是，康海《与乾州太守赵君书》作“张和”，今依《实录》。

⑭康海《与乾州太守赵君书》，修于义军攻乾州后数日之内。

⑮⑯⑰⑱雍正《陕西通志》卷五十二。

⑲参看《国榷》卷五十三、雍正《陕西通志》卷五十二。

⑳《明史》卷二〇二《马理传》。

㉑宣统元年重修《眉县志》。

㉒参见注①②引文。

㉓嘉庆《续武功县志》卷二、康海《姜武功平贼序》作“于敖”，《眉县志》、康海《与乾州太守赵君书》作“于翱”，今依前者。

㉔《明实录·正统英宗实录》卷一二七。

㉕参见沈定平《明末“十八子主神器”源流考》，载《明史论丛》第一辑。

㉖参见《明实录·正德武宗实录》卷九十五、《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